

2024.3.23

星期六 甲辰年二月十四
今日4版 第8457期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邮发代号 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做学问要“竭泽而渔”

记者：最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了您和李遇春主编的《近代旧体诗文集萃编》(以下简称《萃编》)，该书和20世纪60年代您就参与过编选的《近代诗选》有何不同？

杨天石：近代社会文化和出版事业远较古代社会和清代前期社会发达，文人众多，诗文集也众多。《萃编》所收诗文集，主要创作于晚清至民国时期，刊行时间主要集中于1912至1949年之间，共计606种，成书200册。在此之前，已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《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》、广陵书社的《民国诗集选刊》、巴蜀书社的《近代诗文集汇编》等多种丛书，对近代诗文集进行了部分整理。为避免重复，我们的原则是：凡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丛书中已收录者，《萃编》不再收录；凡近年来已整理刊行的单行本别集，《萃编》也不再收录。

记者：60年前您就参与编选《近代诗选》，是不是那时就非常喜欢诗歌？

杨天石：在中学时我就喜欢读中国的古诗。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，我想研究这一高峰形成的原因，为新中国的诗歌发展提供借鉴。于是，我大量购置唐代诗人的总集、别集、选集。从“初唐四杰”到晚唐的皮日休和陆龟蒙，唐代诗人的作品集我大体上都买齐了。自然，我第一个关注的是李白。在研究过程中，我发现李白一生最佩服的人是南齐诗人谢朓。由于李白一再称赞谢朓诗的艺术成就，所以清人王士禛曾赋诗称李白“一生低首谢宣城”。恃才傲物、狂放不羁的李白为何一辈子在谢朓面前低头，这是我想探求的秘密。我仔细研读谢朓的作品及其相关资料，连一向不为人注意的赋体作品都逐字逐句地探索。为此，我甚至持书向为我们讲授这一段文学史的冯钟芸教授请教。冯教授惊讶地叫道：“你读书这样细致呀！”

记者：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近代诗的？

杨天石：我读北大中文系时就很想编一部《近代诗选》，因为这以前有几本书编选得很好，在读者中影响很大。如：余冠英先生编写的《汉魏六朝诗选》、马茂元先生主编的《唐诗选》、钱锺书先生的《宋诗选注》等。当时我还是学生，就想编一部《近代诗选》。于是，我和孙静、孙钦善、陈铁民等同学共同组成《近代诗选》编注小组。为了选出好诗，曾经翻阅过那一时期出版的大量诗集，并且逐年、逐月、逐日、逐页地翻阅过几十以至上百种报刊，花了时间和精力。

记者：当年考入北京大学，您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研究的方向吗？

杨天石：我报考大学时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作为第一志愿，试图走从新闻记者到作家的途径。入学后划分专业，在新闻学和汉语言文学两个专业中，我选择了后者。读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汉语言文学专业再细分为语言和文学两个专门



杨天石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

化。我选择了文学专门化。我原来的理想是写诗、写小说、当作家，后来才转变为研究文学，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经验。

记者：您是中文系出身，1960年毕业离校以后，由中国文学转而研究中国哲学，又转而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，所以您自称“钩挂三方来闯荡”。金冲及先生就注意到，您选择的研究课题，大多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、因而被史学研究者谈论过多次的问题，但您从不采取人云亦云的态度。

杨天石：我原来学文学，这使我善于用浅显明白的语言表达和分析艰难深奥的哲学命题。例如，我在叙述“理学”和“心学”这两大“道学”流派的不同时，从思维途径和论证方式入手，指出朱熹是从火必向上，水必向下，四条腿的椅子抽去一条腿必然坐不稳等自然现象出发，来论证为子尽孝、为臣尽忠等道德伦理观念的必然性；而王阳明则以目自明、耳自聪等人的生理本能的天然性，以此论证子孝、臣忠等道德伦理观念同样具有天然性。这样的叙述和分析就将“理学”和“心学”两大流派的区别及其致误原因讲得很清楚明白，似乎前人还没有这样讲过。

记者：寻访各种珍稀未刊档案、日记、函电等第一手资料，考辨探微，钩沉索隐，多数情况下，人们用“冷板凳”形容学术研究之苦，您在学术研究中是怎样的状态？为什么您会取得这么丰硕的研究成果？

杨天石：自来的政治家，人们可以从他的公开言行去观察他，研究他，但是政治家很少向公众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因此，历史学家很难了解政治家公开言论背后的真实的隐蔽的意图。比如我写《戊戌密谋的见证人毕永年》，毕永年的日记我是在日本的档案里看到的。我做学问最大的特点是“竭泽而渔”，就是把所有能看到的资料都要找到，不仅是国内的，国

外的也都要想办法见到。当时我还没有出国条件，但是通过进口胶卷可以看到。

记者：在繁杂的资料里敏锐地发现有用的东西，是不是还需要一些技巧？

杨天石：一个办法是善于使用，一个办法就是多看，中国的外国的都看，特别重要的是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日记书信。我去哈佛大学访问见到图书馆的馆长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们这里藏书很丰富，一般的图书我不看，我要看的是你这里保存的没有公开过的近代人的日记、书信。”胡汉民研究也是如此。哈佛大学藏有大量胡汉民往来信札，其中充斥着各种隐语、暗语、密语，破解这些暗语和代号，需要细致绵密的考证和历史文化知识的深厚素养。

记者：这些没有发表的书信日记，当然会从中发现到很多有价值的新东西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难题，书信都是手写体，如何准确识别也有些挑战吧？

杨天石：对。首先对于作者的身份背景，包括当时的历史环境、书法都要有了解，另外要有一点辨读行书和草书的能力。

记者：这个能力是怎么养成的？

杨天石：不瞒你说，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英语，学了8年，后来进了北大，改学俄语。到了近代史所之后，我觉得英语不够用，俄语也不够用，又自学日语，甚至于研究古代的日文。所以可以有一些发现，譬如说黄兴给日本人的书信，那是我自己翻译的。好多资料在中国没有，是保存在外国人的档案里。如果你要想到外国去找材料，你就一定要懂那一国的语言。

记者：您认为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必备的素养是什么？

杨天石：写文章要符合八字要求——准确、流畅、精炼、生动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准确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坚持认为，史实比原则重要，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，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最重要的标准。我觉得，过去，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“从原则出发”。

记者：您的藏书一定很多，有枕边书吗？

杨天石：做了一辈子学问，藏书当然很多，家里的书房、地下室，还有近代史所的办公室，都是我藏书的地方，还是不够用，所以我为自己的书房取名为“书满为患斋”。我是这样，没有固定的枕边书，研究什么用什么。如果说是固定的“枕边书”，用得最多的可能是字典，包括王力的《古汉语字典》，还有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，这些都是翻得比较多的。我一般晚上工作到10:30，然后回房间休息，休息时我就上网，看手机了。想睡觉的时候，会在两分钟之内就睡着，所以不需要看书催眠。我原来是“三能”的老人，能吃、能睡、能走路，现在能吃、能睡这两个特点还保存着，走路已经不行了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